

内生型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风险及其防范

——基于企业家资源的视角

黄建康¹, 黄睿²

(1.江南大学,江苏 无锡 214122;2.厦门大学,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企业家对内生型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但同时也可能产生“柠檬市场”、同质竞争、企业或企业家群体外迁等发展风险。基于企业家资源的视角,规避内生型产业集群发展风险,需要适当控制群内企业家的效仿性,克服“搭便车”观念,提升集群内企业间的竞争度,弘扬企业家精神,促进企业家创新,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营造企业本地化集群发展的创新网络,积极应对群内企业或企业家的“抱团外迁”,提升群内企业的根植性。

〔关键词〕 企业家资源,内生型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1)03-0065-04

萨克森宁(A.Saxenian)的研究表明,在产业集群的最初发展阶段,外部效应、集聚因素和结网协同对集群并没有太大的影响,而企业家活动、他们对承担风险并建立新企业的愿望,以及他们进入现有技术和市场领域的的能力对于集群的产生都是决定性的。^{〔1〕}(P423-437)企业家作为一种特殊资源参与企业的价值创造过程,因此,产业集群的发展尽管会受到种种区域资源的影响,但企业家资源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资源,就在于其表现出的对其他资源的整合能力。这种能力是一个企业乃至一个集群取得竞争优势的最重要的能力。正是在这一逻辑层面上,企业家资源的供给及其流入对于地方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意义重大。然而,企业家资源对地方产业集群与发展的作用也具有两面性,即基于企业家资源实现的内生型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模式,也许是集群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美丽”陷阱。

一、企业家对内生型产业集群形成与发展的作用

我国的内生型产业集群主要是依靠当地的资源禀赋、原有的工业基础、当地的市场、地方企业家的创新精神等获得发展,如广东顺德的家电产业集群、浙江温州的低压电器产业集群等。实证研究表明,尽管企业家不同的思维方式、经历、技术和教育背景使其在对待外部机会、威胁和风险时的态度及企业创新上的差异性较大,但是企业家的地理邻近性,一方面使得他们的行为会引发示范效应和竞争效应,激励区域经济持续创新发展,另一方面又使得他们可以通过创建地方产业发展网络,重新配置地方要素资源,并促进资源、技术与信息在整个区域的流动与传递。企业家对内生型产业集群形成与发展的作用机制如图1所示。

〔收稿日期〕2011-03-2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我国利用外资中比较利益增进机制及实现途径研究”(10YJA790098),江南大学“跨国公司与区域经济发展”创新团队发展计划(2009CXTD02),负责人李晓钟。

〔作者简介〕黄建康(1965-),男,江苏苏州人,江南大学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网络经济学与跨国企业管理。

黄睿(1990-),女,江苏无锡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2008级经济学专业双学位本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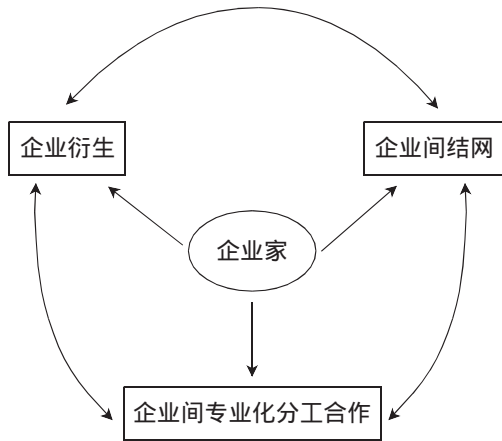


图1 企业家对内生型产业集群形成与发展的作用机制

(一)企业家活动促进企业衍生,在企业不断衍生与集聚过程中形成地方产业集群。企业家作为市场风险的承担者,其创业受到市场效率与要素供给、产业配套等激励和制约,因此,寻找市场机会是企业家的职责。在地区现有资源条件下,由于一些外在的或偶然的因素导致创业机会产生,这些现有资源和创业机会就会被潜在企业家发现并加以利用,从而出现企业家的创业活动。尤其是当某一企业创造出利润时,由于人对利益追求的自发性和普遍性,其他企业家必然会有强大的动力去追逐这一利润。如果利润来自于廉价劳动力、特殊的地方自然资源及优惠政策等区域资源优势时,先行企业就难以形成垄断能力,无法阻止其他企业的进入。随后出现的便是企业数量的不断增加,地方产业集群也就在企业不断集中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从浙江产业集群发展的经验来看,或者是地方政府为企业家改善当地市场环境,或者是领先企业家的创业示范作用推动了创业过程得以实现。二者在集群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意义都在于外部性。^{[2](P86-93)} 地方政府作为企业家的外部性意义在于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而领先企业家的外部性则在于知识扩散而引致的外部学习效应,以及由此带动的大量企业家效仿而形成的企业衍生。因此,从企业衍生的角度看,创业的企业家在产业集群中发挥了“示范者”角色,其意义就在于,企业家对其他的个人产生了影响,促使更多人创立自己的事业,从而促使更多企业家的产生,同时也伴随着企业在这一地区的“繁殖”,最终形成产业集群。

(二)企业家通过企业间的结网行为,构筑了地方产业集群与发展网络。从地方产业集群的形成来看,集群并不是由一个个孤立的企业扎堆而成的,而是通过企业家的地方网络相互交融形成的有机

系统。企业间的结网行为从更大的意义上说,实质就是企业家的结网行为。企业家的社会关系网络是其创业机会成功的主要来源,因为企业家的社会网络与产业网络是物质、信息、技术与知识从某企业家的企业扩散到集群其他企业的重要渠道。企业家的社会关系网络越密集(与外界联系越多),其创业感知力就越高,越容易感知到潜在的创业机会。因此,通过企业家的桥梁功能,独立的企业家网络编织成了集群网络,各类信息、知识在集群网络中流动、传播,进而促进集群的形成与发展。

(三)集群内企业通过广泛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实现最优价值链分工,提升集群效率。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产业集群还是一种分工合作机制,是分工网络扩大与合作秩序扩展的结果。^{[3](P15)} 从产业分工角度看,企业家通常只能在某个或某些环节上展开创业活动。一般地,企业从事与自身能力相适应的活动,因而企业的边界由它的能力所决定,企业通过对各种活动的协调,在其生产和服务过程中体现其能力。由于企业所从事的只是某种分工活动,所以其活动都与其他企业相互依赖或相互补充。这样,就使得许多创业者围绕某特定产业进行创业活动,从而出现了创业企业围绕某产业集中创业,通过截取产业链上的不同环节进行创业,并实现了产业内的分工与合作。产业集群关系网络的形成实质上是价值链网络的形成。企业依托自身特定的资源和能力在价值链网络中处于不同的位置,形成专业化分工的网络。^{[4](P4-7)} 从这个意义上说,促成产业集群关系网络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企业在资源和能力方面的异质性,由此才能实现专业化的分工和合作,以共同构成完整的价值链。企业家通过企业衍生与企业间结网而组成了庞大的关系网络。这种网络使创新在集群企业内扩散,从而产业集群通过内部分工的外部化实现了规模经济效益,集群内企业通过和供应商、客户的上下游产业合作,实现了最优价值链分工。

二、内生型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风险的形成

在产业集群初期,企业家之间的信任大多基于血缘、地缘和情缘,企业家的口头承诺是企业间信任的主要形式,口头承诺成为企业家之间信任的主要表现。然而,随着集群的发展,群内企业开始具有地理上的根植性,企业迁址的机会成本会越来越高;多次重复的企业间合作,使得企业的行为逐渐成为某种制度约束;共同的价值观念和产业文化的形成,使企业的行为越来越发展成为一种路径依

赖。因此,从企业家行为的角度看,当集群形成一个比较封闭的发展状态,企业家行为模式趋同使集群内的创新行为减少而模仿行为增加时,必将引发产业集群与可持续发展风险。

(一)形成“柠檬市场”。“柠檬市场”的形成是由于企业行为短期化而引起的集群整体产品质量和信誉下降的过程。^{[5](P143-145)}其所引致的集群发展风险的机理是:

1. 集群内企业家的效仿性引致知识过度共享的风险。由于集群内知识和技能的高度外溢性,使得大量企业都想坐享知识溢出的好处,从而使大量企业家选择效仿性行为,追求短期利益,而不愿自行研发投入进行创新。这种“搭便车”的方式在企业家中滋生惰性的同时,还严重挫伤了创新带头者的积极性,引致集群内产品的同质化、雷同化,乃至集群内企业间的恶性竞争。这将严重削弱集群应对外界变化的能力,从而引致集群衰落的风险。

2. 在利润驱使下,个别企业家在这种效仿中生产伪劣产品,在“柠檬市场”产品质量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引致整个集群企业都可能陷入信誉危机,企业家社会资本作用削弱,最终可能引发某个企业家首先带领企业退出集群的行为。在“效仿性”强势的环境中,企业家带领企业退出集群的行为进一步加剧,最终将使地方产业集群瓦解。

(二)强化同质竞争。专业化分工与合作是集群的一种主要经济组织和创新方式。但随着专业化分工和企业的空间集中,客观上提高了竞争强度,同行竞争更趋激烈,形成了集群的竞争同质性。^{[6](P65-69)}其所引致的集群发展风险的机理是:

1. 产业定位的同质性。我国传统的产业集群大多是在乡镇企业基础上产生与发展起来的,而乡镇企业先天的小规模决定了我国产业集群大多以劳动密集型的轻加工产业为主,技术层次与科技含量较低,进入壁垒不高,产品结构单一,长期以来把产品锁定在低端市场,这就有可能造成产业定位所引发的发展风险。与此同时,集群企业凭着劳动力与生产成本的低廉,使得企业产品出口价格优势明显,但当面临日益递增的国际反倾销压力与进口国的技术壁垒时,就有可能使集群企业的同质化产品市场竞争力大为削弱,集群企业利润微薄。因此,一旦某类产业(或产品)出现衰退,整个集群将面临极大的发展风险。

2. 生产产品的同质性。由于集群内企业的整体弱小性、集群内大多数企业的知识“锁定性”,以及

集群内部企业行为的“效仿性”,可能造成群内企业生产产品的同质性所引致的集群发展风险。

3. 经营方式的同质性。这不仅包括营销方式的同质性,更包括技术活动与创新方式的同质性。由于企业之间的学习是“干中学”,而且群内企业的产生大多是基于企业“裂变”,“子企业”和“母企业”之间有着天然的行为基因,因此,群内的企业大多会采用相同或类似的经营方式。与此同时,由于群内企业的技术多基于相同的“技术源”,这种技术同构将引致企业间的学习效应弱化,影响集群整体竞争优势的持续发挥,从而可能引发集群的退化。

(三)引致企业或企业家群体外迁。当产业集群所依赖的资源出现枯竭,集群所在地的环境竞争压力超越了群内企业的承受能力,集群所能够带来的经济利益日益递减,集群企业生产的产品不再能够满足市场的新需求,同时也出现了具有更强优势资源的新区域时,企业家就会像生物体一样,进行新区位的选择。企业家的区位决策行为对集群产生影响力的大小与该企业家的企业在地方产业发展网络中的地位是相关的。^{[7](P43-45)}核心企业家的区位选择所导致的并不仅仅是核心企业本身的迁移,还将带走一大批为之提供配套性产品与服务的企业,最终引致集群的衰落。

三、规避内生型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风险的策略

(一)适当控制群内企业家的效仿性,克服“搭便车”观念,提升集群内企业间的竞争度。如果在集群内大量发生无成本模仿或低成本模仿,必将使创新企业收益耗散,并最终引致群内企业技术创新源的缺失,使集群竞争力受到重创。因此,适当控制群内企业家的效仿性是基于企业家资源视角的防范集群发展风险的有效路径之一。

1. 不断引入新企业,改变群内企业的企业家行为。通过新企业的引入,促使原有企业改变经营思想、更新经营手段,从而产生集群内企业新的经营范式,实现集群的持续创新和突破性创新。

2. 提升企业家的自主学习能力,实现企业家从简单行为效仿到本质提高的转变。地方政府可以通过专门的培训活动,促进已积累的复杂知识的传授;通过举办技术研究或进行新兴产业发展战略的探讨等手段,避免隐蔽的无序效仿可能导致的“柠檬市场”;为模仿创新建立制度化的渠道,以适度控制企业家的效仿性,从而使企业家从出于利润追逐的简单效仿创新产品转向效仿创新理念与行为。

3. 通过企业家联盟等形式,增强对知识的整合

开发能力,促进新知识的创造。^{[8](P184-185)}通过建立地方“技术服务中心”促进群内企业更好地开发新产品与新技术;通过有效的集群政策为群内着力创新的企业发展新技术提供资金支持;通过企业家联盟等形式形成企业家适度控制效仿性的自律环境,引导企业家将个人效仿性意图公开化;通过讨论等方式实现知识的整合与开发,激发创新行为。

4. 促进产业集群内社会资本的深入与强化。社会资本是建立在企业群体范式上由信誉、规范引导的企业家社会关系网络,而信誉是社会资本的基础价值。但是,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契约各方履行各自的职责是基于群内企业的相互信任。相互信任是企业间合作与联系的基础,并能够使企业之间的合作稳定化与长期化。集群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和规则普及可以改善企业家之间的交流,而企业家间的交流可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对效仿性的约束。集群内企业家之间“开诚布公”的共识能够使群内领先企业家敢于拒绝其他企业家的过度效仿,敢于运用知识产权保护、技术创新保护等法律手段解决问题。

(二)弘扬企业家精神,促进企业家创新,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企业家所在区域的环境如资源状况、文化传统等,对企业家创新具有重要影响。因此,通过企业家精神的引领来促进地方企业家的创新也是有效规避集群发展风险的策略之一。

1. 保证集群的开放性,使群内信息多元化发展,以创造一个利于创新的环境。企业家才能更多地表现在对市场环境的敏感和机会的识别上,以及在忍受可能风险基础上表现出的创新行为。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推动群内企业并购、与区域外企业合资合作,或者是吸引带有新信息、新技能的创新企业来该地区,支持地方生产系统中出现新的联系,从而促使群内企业家对外部环境作出积极反应,营造出利于创新的“空气”。

2. 促进企业家观念创新与管理方式的创新。我国传统产业集群中的大多数企业是中小型民营企业,其管理体制主要是家族模式,其管理行为往往具有封闭性和保守性,较难形成鼓励冒险、创新而容忍失败的企业文化。而国内外成功企业的跨越式发展表明,企业职业经理人的引入对企业发展壮大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也是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内容。因此,促进企业家在观念上的创新,一方面可以避免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等创新模式引致的资源“锁定”,并更有利于职业经理人的引入;另一方面,职业经理人的引入有助于企业家接受现

代管理思想与管理模式,从而有利于企业实现管理方式创新。

3. 不断完善集群的咨询、科研等服务性机构的建设。咨询、科研等服务性机构能够在企业家创新过程中及时地为企业家提供信息、技术等方面的支持,从而帮助企业家实现创新,也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培育奠定基石。

(三)营造企业本地化集群发展的创新网络,积极应对群内企业或企业家的“抱团外迁”,提升群内企业的根植性。企业或企业家的“抱团外迁”是市场经济下的一种经济行为,是企业成长的内在需求和资本逐利性的自然体现。因此,地方政府部门可以引导,但不能进行强制性管理。客观地面对企业或企业家外迁,并采取相应的对策,显得尤其重要。

1. 地方政府应正确把握企业外迁的特征。在集群范围中控制产业链中的核心和高端环节,如设计、营销、关键资源和关键技术等附加值高的运作环节,从而保证本地的产业集群不会因为“产业空心化”而昙花一现。

2. 从集群与地方经济的互动发展关系看,积极应对“抱团外迁”的关键内容是将低层次的企业外迁,但留住优秀的企业或企业家,如鼓励劳动密集型企业跳出本地,到土地、劳动力、能源等生产要素价格更低的区域发展;同时制定有关配套政策,引导和鼓励大型跨国公司或国内行业龙头企业来本地从事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的投资等。

参考文献:

- [1] A. Saxenian. The Origins and Dynamics of Production Networks in Silicon Valley[J]. Research Policy, 1991 (20).
- [2] 吕文栋,朱华晟.浙江产业集群的动力机制——基于企业家的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 2005 (4).
- [3] 郑健壮.基于资源整合理论的制造业集群竞争力研究[M].武汉: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5.
- [4] 向希尧,朱伟民.产业集群中社会资本的作用研究[J].工业技术经济, 2006 (6).
- [5] 仇保兴.小企业集群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
- [6] 陈柳钦.产业集群创新问题探讨[J].甘肃理论学刊, 2007 (1).
- [7] 邓宏兵,李俊杰.企业家群体性外迁与企业集群发展[J].商业时代, 2007 (18).
- [8] 吴先华.内生型产业集群知识创新[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1.

责任编辑 于晓媛